

【文学观澜】

大船的“德泽” ——读方远的《大船队》

□马兵

山东作家习惯“大”处落笔,《大法官》《大染坊》《大铁像》《国土大铝》……几乎新世纪以来每一个重要时段,都有一部以“大”命名的厚重之作出自山东作家之手。它们普遍具有深邃的历史感、丰沛的文化意识和宏阔的时代容量,其内蕴的现实主义品格和深沉的道德立场更是为文坛瞩目。2016年,方远出版了《大河入海流》,在鲁籍作家的“大”字谱里留下自己的名字。那之后,他一直为家族跌宕的历史和先辈可歌可泣的故事鼓舞着,于是,八年过去,将家族史与民族史熔于一炉的长篇新作《大船队》问世了,小说不但延续了“大”字当头的写作立场,也努力在“大”的格局上做出新的拓展。

《大船队》的故事发生在胶东半岛掖县的方家村,说的是以耕读传家的宏德堂到了方英典堂主这一辈,打开眼界向大洋,创立宏德堂大船队,并亲自带领船员穿越渤海湾,驶向东三省,开启海上贸易。从莱州湾到东三省的旅程,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心理跨越。方英典的成功引发匪性十足的宋占山的覬覦,在接下来的三十余年中,方、宋两家围绕船队生意和人事往来屡生波折:方家以仁德立身,在康庄大道上行稳致远,而宋占山无所不用其极的下三滥作为居然也为自己开出一片黑暗天地,正邪相争,善恶相衡,读来很是令人难忘。笔者以为,宏德堂的“大船队”既是写实的,也是象征的。小说的骨干情节围绕船队发起、成立、远航、贸易和海洋历险展开,这是其写实的一面;而大船之于大洋,又是一个极富中国近现代史意味的象征——众所周知,《老残游记》开篇即写一艘破船行将沉覆,其破败不堪、遍体鳞伤的状态,直指甲午战争以后的老大中国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刘鹗开启的“以船喻国”不断被后辈作家所摹仿。《大船队》里方英典敢于扬弃祖训,一是他本人有敢为人先的气魄,二来也是为时局所迫的应变。宏德堂船队以海上贸易变更自古以来的家族经营方式,且由海洋贸易带动方家涉足百货商业,逐步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这何尝不是民族企业发展的缩影呢?方英典在渤海之上经历的惊涛骇浪,又何尝不是波谲云诡的大时代中国民族产业经历的一个隐喻呢?小说从“暗潮涌动”写起,到“乘风破浪”收束,虽然方家的“牡丹号”货船惨遭日本敌机轰炸,方兴通和三位游击队员落入大海不知所踪,可在象征的意义上,方家与中国革命志士风雨同舟,必将在民族之“德泽”(方兴通的儿子叫方德泽)的庇佑下,驶向新生的港湾!

小说将方家的盛衰浮沉叠印在大时代的景片之上,不过并不着意在“史诗”性上用力,其重心还在家族的传奇故事以及以方英典为代表的主人公的文化人格上。方远对于小说故事性有自己的理解,内心里也一直把“读者能否读得下去,读得进去”作为评判小说得失的一个标准。小说采取了类似神魔斗法的叙述结构,开篇就写宋占山气势汹汹地闯入宏

德堂兴师问罪,引出方、宋两家之争;在故事展开后,又不断通过插叙、预叙等交代前情或设置悬念,始终保持小说的情节强度。此外,方远还很娴熟地援用了一些影视的叙事手法,像闪回、交叉蒙太奇等,增强了小说的戏剧冲突。比如第九章“明火执仗”,此章写宋占山又去宏德堂挑衅,却被方英典几句话呛得无地自容。剑拔弩张之后,小说忽然荡开一笔,写方英典看到南书房院子里十几只鸽子正飞过来,随即便闪回到四十多年前方英典发现一只受伤的鸽子,由此开始驯养信鸽的往事。这一笔很是巧妙,不但借鸽子衬托方英典清雅的人格,亦通过闪回与前文一起形成张弛有致的叙事节奏。而把同一时间发生在方家和宋家的两种互相对立的行动交叉叙事,如电影蒙太奇一般渲染紧张的气氛、加强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在小说中更是所在多有。小说中很多悬念,比如方家船队遭遇海匪可否化险为夷,宋占山指使手下人去烧方家船队能否得逞等等,其结果其实读者早可判断分晓,但小说并不因此减损它的吸引力,这是与作者调用蒙太奇的叙事手法分不开的。张炜说过:“兴致勃勃和有滋有味的讲述给人一种生命力旺盛的感觉。”阅读《大船队》的感受正是如此,作者饱满的叙事激情洋溢在小说的字里行间。

方英典是小说最核心的角色,“保守”与“进取”在他身上构成一种奇怪的扭结,正如论者所言,方英典的矛盾性“同时也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在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矛盾,这一时期,自由意志、启蒙思想等各式现代理念与传统道德频生龃龉,传统与现代的嬗变在制造‘进步’与‘新人’的同时,也制造出伦理的冲突与身处两难境地的‘历史中间物’”。在这一点上,他与《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很相似,他的命运也折射了“最后一代乡绅”的命运。不过,除此之外,我以为方英典的文化性格构成还体现出山东作家特有的思考,那就是如何批判地继承和弘扬齐文化与鲁文化并做现代之转化。方家所在的掖县现称莱州,春秋时为莱子国故地,属齐国。齐文化求革新、尚智谋、重工商,崇拜海洋也敬畏海洋,这在方英典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山东是儒家文明的发祥地,鲁文化的重文崇文、重人伦宗法、讲究秩序稳定、追求“仁”“礼”的观念早已经内化为方英典为人处世的一种习惯法。他接受刘小虎的自由恋爱,甚至敢于收留宋占山的女儿,可是又不能容忍自己儿子抗拒强加在他身上的婚锁,张扬与退守间,一个立体的人却立了起来。我想,方英典的犹疑与矛盾,其实也是作家自觉文化反思的一种体现吧。

所谓“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质而言之,《大船队》的“大”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作家的兼容并包,对故事性、传奇性的追求和细节真实的平衡,对浪漫和革命的平衡,对变与常的平衡,对世情和史识的平衡,对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平衡等等,在“来自生命深沉情感”的激荡之下,那大船穿越骇浪向我们驶来了。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昆

外面飘洒着冬雨,阴冷得很。为这场雨,我提前一周就为壁炉备好了两大摞木柴。冬天没有太阳的日子,对于在乡下工作的我来说,总是格外难熬。并非没有空调,只是空调太干燥,让人难以静下心来做那些需要细致对待的事。

记忆中,冬天总与鹅毛大雪相连,至于温度,反倒印象不深了。但可以确定的是,小时候的岛城,冬天确实比现在冷得多。记得国庆节去海边看礼花,都得裹上厚厚的毛衣。上小学二年级时,我家搬进了楼房,可屋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直到四年级时才装上炉子。我一直住在北屋,冬天睡觉时除了两床厚重的棉花被,就靠一个大肚子暖水袋取暖。如今已无法想象,那些寒冬的早晨,自己究竟是如何钻出被窝,熬过起床那一刻的。

姥姥家倒是常年生着炉子。那是一座两层的连廊式老房。冬天最大的乐趣,便是跟着舅舅拉板车去煤店买散煤,回来掺上水,用模子压制成一块块蜂窝煤。那份快乐,堪比用黄泥捏制坦克时的兴奋。而用火钩子给炉膛里的蜂窝煤通气,更是有趣。蜂窝煤带来的乐趣远不止这些——在炉边烤包子、烤粉条,甚至把一杯水浇在炉盖上,看着它嘶嘶蒸腾,都能让我安静地坐上好久。

后来,家里的老房被父亲重新装修,花了整整两年。木条拼接的小方格地板,刷了漆的木板墙围,终于盖住了原本难看的绿漆墙面。父母的房间里装上了炉子,也是烧蜂窝煤,但怕我的小北屋通风不好会煤烟中毒,便没有安装取暖炉,那里依旧是“寒冷地带”。不过,家里添了一台投影仪大小的电热风机。每天清晨,母亲都会把它拎到我的房间,用吹出的暖风为我烘暖衣服。那份温暖记忆至今清晰,三十多年过去,我甚至仍能想起那暖风吹出的独特气息。

日子渐渐好起来,家里的炉子逐个被淘汰,换成了电油汀,我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台。再往后,空调走进了家门。我们大院一共八个单元,我家窗户是第一个挂上空调外机的。邻居们议论纷纷,都说老周家买了种“挂在墙外的炉子”。仔细回想,那应该是1994年的事——因为我清楚地记得,那年世界杯,我和父亲是吹着空调看的球赛。

关于寒冷的肌肉记忆,是从2013年到乡下山区从事科研工作开始的。人年纪渐长,对某些事就变得敏感。乡下的环境没有城市的热岛效应,体感也

就更显清冷。空调用过,电油汀用过,踢脚线取暖器,小太阳、发热鞋垫、通电盐袋……全都试过,却总觉得浑身暖不透。最终,我还是决定在办公室里装个炉子。

这几年陆续换过几个炉子,直到我的灵魂依附在了如今这个巨大的真火壁炉上。那是一种久违的温暖,像小时候那般扎实,透进心底。这种温暖让我静得下心,沉得住气,甚至让我对冬天生出了期待。夜幕降临,关掉所有的灯,只有壁炉的火光在眼前跃动。水壶在炉上吐着热气,木柴在炉膛里噼啪作响。

往炉膛里丢几个芋头和地瓜,也放上包子与粉条,带着余温的炉灰烧烤出各种食物的香气。那些遥远的记忆便渐渐清晰起来,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往日的温度。

就这样,我为自己筑起了一个温暖的冬天。壁炉前摆着一张单人沙发、一只脚凳,大多数基础的工作都可以在炉火的直接包围下对着笔记本电脑完成。而那个离炉子只有两米远的传统工位,即便只沾染了从金属壁散出的余温,也足以让我不再畏惧窗外任何寒风低温。也正因为有了壁炉,无论什么时节便都成了捡拾柴火的日子。我在旷野中散步时不会放路边一块被截断的树枝,也会把一些枯柴带回来。早已扔进历史的斧子又成了最好用的工具,劈柴的声音成为冬天里不可或缺的音符。我恭恭敬敬地将柴火码放好,静待时间将它体内的水分抽干,静等寒冬到来,它们变成我身心的温暖。

我从小就有个奇怪的习惯:爱看晾在风里的床单,更痴迷于烟囱中袅袅升起的白烟。所以,在保证抽力的前提下,我故意将烟囱砌得低了些,又特意装了一盏射灯。寒夜,光从下往上打,淡淡的炉烟在光里飘,我便能坐在屋内,静静凝视那一缕人间烟火的韵律。如果正好遇上了雪,那便是童话般的风景。低头是暖光笼罩的书页,抬头便是温热缭绕的呼吸,狗子们在暖意中酣睡,猫咪在舒适中清洁身体。于是,即便孤单,也不觉得孤独;即便远离城市,也未曾错过什么丰盛的人生。

这炉火燃着的不仅是柴,还有时光、记忆与安宁。冬天不再是需要熬过的季节,而成了一段可期待的温度、一页可沉浸的叙事。

(作者为天文科研学者、青岛艾山天文台台长、中国天文学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学会会员、青岛市作协会员)



【岁月留痕】
取暖